

中日园林的历史关系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Garden

毛巧丽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上海 200092)

MAO Qiao-li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College,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摘要:

从社会学角度考察中日两国园林的关系, 得出中国园林与日本园林是同一枝干上的两朵花, 中国是本木, 日本是接木。

关键词: 中日园林; 异同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This thesis investigates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garden with the sociological view, and concludes that Chinese and Japanese gardens are flowers came from the same tree, Chinese garden is the trunk and Japanese garden is the its stem.

Key Words: Chinese and Japanese garden; the same and difference

长期以来, 中日两国园林错综复杂的渊源与似是而非的表现形式使人们无法正确地看待两国园林的关系。这时候, 换一种角度, 从社会学的角度我们或许能找到接近真理的答案。

1 同一枝干

我们知道, 日本列岛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世界文化传播途径的限制, 使中国成为日本主要的文化外源地(日本近代史之前), 再加上日本除平安朝和江户朝分别有过一个短暂的锁国期外, 长期保持门户开放政策, 中日之间频繁的文化得以延续了两千年^[1]。

具权威性的日本史学家田中义成博士曾这样说过: “日本史上的重大事件, 都是受中国的影响: 《六国史》的编纂是效《史记》、《汉书》; 奈良朝女帝之多是则以天武后为范本; 将门的谋反不过是五代争乱的恶影响; 足利时代五山僧徒的干预政治, 是因为明太祖出身僧侣, 以致僧徒在禁中发挥势力, 而加以仿效的; 能乐, 则宛然就是中国戏”。他的论点似乎在支持这样一个较为武断的结论, 即中日两国千余年来连续不断的文化交流, 是以一方输出为主而另一方输入为主为特点的。这种情形可以追溯到原始文明缘起的时代, 一直持续到江户锁国。在中日两国的文化历史中, 中国一方更多地带有母本的色彩^[1]。事实表明, 中日两

国的文化发展是先后沿着极其相似的道路前进的。就一般而言, 日本文化的发展仿佛是稍早些的中国文化的非机械性再现, 如同平静的池塘为掷入的石块激起的一旋不息的涟漪。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便不难理解, 作为社会的文化、情趣反映的中国园林与日本园林总体上的相似性与继承性。如都为自然山水园、以山石为主体、水面的不规则形、池岸的曲折有致、岛屿桥梁划分出水面的诸多层次、水口的含蓄处理等等。

2 两枝花

但是, 我们也要看到: 中日两国园林无论是艺术旨趣、造型风格乃至具体的景物配置方式抑或是花木修剪等诸多方面趣味迥异, 截然不同。这种种的不同主要是由文化交流及两国人民的世界观、自然观等方面的差异而引起的。

2.1 文人园与宗教园

中国园林属于文人园, 在这里不再赘言。为什么说日本园林属于宗教园呢? 这亦与文化交流有很大关系。因为在世界文化交流中, 最不受国界、种族羁縻的是宗教思想的传播^[2]。加之禅宗所提倡的心性本净, 佛心本有, 觉悟不假外求, 否定礼仪和读理, 不重礼佛, 强调悟性, 推重实践等特点受到武士阶层特别是中下层武士的普遍欢迎和信奉, 又加之其

收稿日期: 2000-04-07 修回日期: 2000-09-10

代表了当时日本人民所景仰、憧憬的先进的中国文化。所以日本人以极其隆重、顶膜礼拜的方式接受了佛教和寺庙园林。

但是中国宗教建筑往往由“舍宅为寺”而成,所以中国的宫室、府邸与寺庙在型制和形式上不存在根本的差别,这样,寺庙园林与住宅园林的区别也不会很显著。而日本则完全不同了,虽然在日本,也有过类似舍宅为寺的事件,然而日本佛教的推广和提倡是以圣德太子的《国分寺建立诏》开先河的。在此诏书中,圣德太子明确提出要“天下诸国个敬造七重塔一区”,“其建塔之寺,兼为国华,必择好处,实可长久”,还施封各寺土地与人民,与中国的“舍宅为寺”大相径庭。事实上圣德太子和苏我氏的朝廷,为了提倡佛教,曾从朝鲜招用了大批僧侣、佛画、佛像以及建筑寺院的专家,耗用大量的国家经费,建筑了远较当时日本建筑文化水平高的四天王寺、法兴寺、法隆寺等结构复杂、极为壮丽的大型寺院^[2]。佛教势力在日本的突然形成和壮大,使寺庙建筑和园林自成一系地得以发展,然而当佛教思想的流布之广到了贯穿于日本民族个性的时候,佛的思想、活动就与普通人的生活、文化密切相关,佛寺园林的一些特征开始出现在普通的住宅与皇家园林中,日本园林从而走向宗教园。

同时,亦是日本的民族个性中宗教精神过甚的缘故,使得日本园林与中国园林就园林设计有否成法的问题上走了不同的道路。中国园林造园的主导思想是避开嚣烦,寄情山水,因而园林自身必然是师法自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成为中国园林的唯一理想目标,但自然是千变万化,形态万千的,“园有异宜而无成法”就成为造园家们不断创新的思想基础,也成为品评园林优劣的一个衡量尺度。中国是“三玄”的故乡,又有悠久的文化历史,自然许多神秘主义的禁忌、条例便会产生和流传下来,不过,在日本类似的禁忌和规矩已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行为约束体系,造园艺术在这样的民族心理影响下必然也带上了许多神秘的“意义”,受着许多禁忌的左右。平安时代的寝殿造庭园就已带有浓重的程式化味道,随着日本造园艺术的发展,成法越来越多,终至每一石组都有一定律可循,有一定条例可依,沿池一周的每一曲折,延伸都由一个程式化的构图原则束缚着。所以,我们不能说日本园林的成就不高,它确具荡人心怀的惊人魅力,也不能说日本的园林各自个性不突出,而应说其共性的表现很突出。

2.2 人工见自然与自然见人工

对意义的认识,或对景观意境的把握,首先建筑在人的自然观的基础上,明确了自然观的不同无疑是找到了理解景与意境的源泉。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具有一种传统,即把人及人的力量纳入自然之中。中国人的一切行为都流露出趋附天地运转规律的倾向。而日本则完全不同,他们的自然观起源于蔑视太阳和大地的神道,这种神学引导他们旁观着自然,即冷静地赞美和欣赏大自然却从不企图介入、适应或影响自然的

进程。经历了禅宗文化的冲击后,他们又赋予旁观自然的态度以更深层的意义,通过心灵与自然沟通而进入个人的反省之中。可以说,中国人用人为的力量再现了自然的美,而日本人则通过对自然美的塑造发现了人自己。因而,中国园林达到的效果是“人工见自然”,而日本园林达到的效果则是“自然见人工”^[4]。

日本民族性的自然观也改变了日本民族的空间观念。中国人的室内外活动是绝对的,而由于日本人以十分淡漠的态度看待严寒酷暑,他们的室内外活动是相对的。日本人不仅继承了中国人“席地而坐”的传统,并且还把它带到了室外。日本人的室内外相应活动使他们的室内外空间具有同化的趋向。大量府邸遗址表明,日本住宅往往室内空无一柱,善用软隔断,围护结构薄而透明,并设置外廊作为室内外空间的对话舞台,它既是室内又是室外,这种两元的空间被日本当代著名建筑师黑川纪章命名为“灰空间”,所有这些都为我们勾勒出日本人的内、外空间感受,赞美和欣赏大自然,却并不企图改变自然,人类的户外活动并不意味着对严寒酷暑的畏惧,因为室内同样也是裸露在大自然中的室外。中国则是高墙大院,土坑暖阁,一遇恶劣天气,掩上门窗,便与外界隔绝。唯用亭、廊向自然开敞,却往往只作歇息、登临、流通之用。总之,由于中国人对自然又敬又畏的态度,使得空间使用泾渭分明,不若日本往往实施空间的“多用途共融”^[3]。

3 本木与接木

中国园林与日本园林本木与接木的关系在中国的无水不园与日本的枯山水园中可以得到明确的印证。

中国园林“山以水为血脉”,穿池掘沼为造园之先。苏州网师园西部殿春簃小庭中,虽已不能有池沼涧溪之设,然而“涵碧”之泉的开凿,即存“水贵有源”之意,与大池一脉之水形成遥相呼应的整体,绝处逢生,救活了这一无水之园,可见中国园林达到了“无水不园”的地步。

日本早期的池泉庭园、寝殿造园林也继承了中国园林的这一特色。但枯山水园与枯山水手法的存在,与中国的无水不园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无怪乎有人断言,枯山水的手法“完全不是将中国园林作为其根源的”。我并不赞成这一观点。《梦窗国师年谱》中揭示,洪隐山之景的产生显然源于中国宗教故事的启迪,而之所以在这无水之地要以水为对象构景,则是受了苏东坡诗句的影响^[3],构筑枯山水与李渔“天然图画”的意图亦基本相同,都着眼于以小拟大的缩景手法,中国文人园中普遍运用的独立石峰也与之处于同一水准,因为它们都是以一石见全峰思想的产物。这些都暗示了室町以后日本艺术的一个特色,即虽已很难从中国直接找到一个可信的母本,却总是寓育着与中国文化及其传统的种种关联。善于学习而又不盲目学习的民族特性,终于使日本园林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高水准——以龙安寺方丈石庭为标志的平庭枯山水。它借鉴中国水墨山

水画的表现技法,以岩石、白砂、青苔等作素材,运用象征主义、抽象主义的表现手法将此三者巧妙组合起来。不着一草一木却能摹写、容纳大千世界的自然万物。依赖于造型又不拘囿于造型,不以形似取胜而以意境见长,这便是它的彻底性。它的素材越单纯,旨趣越彻底,它所能表现的内涵也就越丰富。

可见日本庭园艺术有借鉴中国园林的地方,又有高于它的地方,这与生物学的嫁接培植在方式、结果上都有惊人相似之处。较之中国园林,日本园林在现代受到较多的青睐。为什么?还是看看枯山水,赋予不同形态的自然石以不同的意义,是它的产生根源,日本还对石形进行科学的分类,而类似的对石分类在中国就稍欠严密,因为中国的造园家更多地靠揣摩、测度先例、画理来丰富自己的见识。中国造园强调“三分匠,七分主人”,自然不需代代相传的专业工作者,偶尔有,亦被称为匠人,地位极其低下,不象在日本产生了“山水河原者”这样的社会阶层。梦窗等被尊为国师,潜心研习,久之则产生了科学化的技术体系,加之其素材的单纯性和旨趣的彻底性很投合强调量化、分类、单纯、概括的现代口味,而中国园林却是通过复杂多样的素材,造型和布局浓缩局部自然景观,其意境虚无飘渺,这些对烦躁、急于求成的现代人来说似乎是太难了。再加上两国经济实力、宣传力度等方面的原因,局外人将日本园林作为东方园林的代表亦不足为奇了。

4 结语

由上,我们得到,中国园林与日本园林是同一枝干上的两朵花,中国是花木,日本是接木。虽然,本末不可能倒置,中国园林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渊源和特色不可能被轻易抹杀。但在全球文化交叉互融的浪潮中,某种文化没有很好地坚持特色,发挥特色,没有强有力的经济支撑,很难说它不会被相近的,强有力的文化光辉所遮蔽。这即是中国园林的危机所在,每个专业工作者直至每个国人都应对此危机有清醒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 日本学(1、2、3、4、5、6)[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2] 常任侠. 海上丝路与文化交流[M]. 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
- [3] 段律音. 中日比较园林研究[D]. 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1987.



作者简介:毛巧丽/1974年生/女/浙江义乌市人/1997年获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学士/2000年获同济大学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专业硕士/已发表“孰领风骚——对世界园林历史演变之分析与展望”、“上海旅游业发展目标的重构及达成建议”、“人类聚居环境剖析——聚居社区发展元素及其量化研究”等论文。

园林与“人—境”系统关系探究

吴祥艳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北京 100084)
刘冬云 (河北农业大学,河北 保定 071001)

摘要:

探讨园林本源——“人—境”互创系统对发展现代生态园林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分析“人—境”系统时空特征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园林与“人—境”系统的关系:即园林是“人—境”系统的子系统,它既具有“人—境”系统的全部特征,又具有区别于其他子系统的空间环境“场所性”特征。

关键词:园林;“人—境”系统;场所性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B

1 “人—境”系统

研究园林如果仅限于从园林空间本身去探索其相互关系的“本体论”,是苍白无力的,从园林“本源论”去揭示园林功能特性与空间结构形态间的因果必然性及其反馈、映射关系,提炼和发现两者之间的规律性,并加以量化的反应及形态表现才有说服力。园林之源为何?笔者认为:造园活动之本质是人类创造性活动,人类的任何创造性活动都隶属于“人—境”系统,故园林之本源是“人—境”互创系统。

1.1 “人—境”互创是人类创造性活动之本源

“人—境”互创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一个著名命题^[1],对该命题作一个泛化解说——“人”是以“人—境”图式创造自己的,“境”是以“人—境”图式创造“人”的,人类的任何创造性活动都存在于“人—境”系统中。劳动是“人—境”系统得以存在的、发展的动因,而劳动过程的本质是主体的客观化和客体的主体化相统一的过程,它如同一把两头锋利的雕刀,一头雕刻着自然,变自在状态为自为状态;一头雕刻着人类,变“感性生物人”为“感性——理性——实践人”。“主体——工具——客体”的运作过程是任何劳动过程的程式化的表现。主体即人,客体即自然界,工具则包含着有形的实体工具和无形的科学技术,这三者是劳动过程得以延续的三大流变因素。三大流变因素即分立又联合的架构和态式,具体而又奇特的体现着宇宙系统的运作规律——“宇宙全息统一律”。其中的系统理论认为:宇宙整体上看是处于永恒、循环往复之中,任一子系统的发展过程都是系统发展史乃至宇宙发展史的一个缩影,是其简略而又迅速的重

收稿日期 2000-01-20 修回日期 2000-08-28